

学者理论品质决定理论转向

郑鹏 湘潭大学社会学教研室

理论被质疑之后的“理论承诺”不再是谋求新的宏大理论或主义，而是化理论为学者的“德性”。着手于理论构建工作的学者应该首先重构自我的理论品质，以学术为业，从以立法者为企图的普遍学者转变为从事专门研究并提供新分析工具的特殊学者。

一直以来，凭借科学的方法论，部分学者声称自己能够从个别事物抽象出“规律”。与此同时，叙述“真理”的话语系统被“发现”的规律打包为具有普遍适用性与客观性的系统化知识，即可见、可言说的理论。由于是从诸社会事实中抽象而出的“共性”，学者们便认为理论高于现实经验，并可据此解释具体的经验，甚至还积极地试图改造现实。因此，理论就像被学者豢养的海怪克拉肯，伺机而动，袭击海面上的船只，留下巨大的漩涡之后又迅速潜入海底。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理论本身及其所拥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

理论影响经验实践

福柯依持系谱学，打破了“真理”引导自由的传统观点。他直言，不预设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于是，受福柯的“知识/权力观”的影响，而“知识就是权力”的新视角开始悬置知识的客观性与可靠性。福柯的权力观确实具有解构效力，但也侧面确认了知识的力量，因为，只要个体生活在意义之网里，就难以逃脱理论的束缚。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正是理论自身产生了检验事实的实验，正是理论构造了社会现实，以及科学家研究的‘事实’”。“理论先于观察”，或许这才是理论的力量所在。

如此，个体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一个由理论话语拟像而成的社会。所以，在元话语遭受侵蚀之后，便难以得到一个关于理论真假的验证机制，甚至真假本身都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如此，原本预示着解放的新科学精神变得捉摸不定。因此，如何重构理论，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理论转向关键在于学者角色转变

促成理论转向的关键在于从事理论建构工作的学者自身转变。学者必须放弃“立法者”的角色，转向关于“危险”的批判者角色。即如福柯所强调的，无论因时势而异的理论是好是坏，但必须明确任何理论都是危险的。

即使理论是危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消灭一切理论。而是说，理论的内在危险必须被警惕。“危险”往往是反身性的。如果不分轩轻地对待所有理论的危险，“危险的方法论”就会制造另一种理论的极权。批判理论的危险所指向的中心是，理论成为“主义”的倾向或霸权的企图，即不可容忍的危险。于是，福柯指出，“如果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我们就总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由此，理论解构的否定性便孕育出了建设性的效应。

如果理论是对事件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解释，那么，针对理论的危险的批判并不是在建构新的理论。针对理论的危险的批判很有可能既没有拿出一种替代选择，更不会导出社会行动。那么，针对理论的危险的批判的意义在哪里呢？胡适曾经根据易卜生的小说《玩偶之家》改写过一个名为《终身大事》的剧本。剧中，娜拉出走成为当时女性争取自由的典范。但鲁迅对娜拉的一走了之很不满意，认为易卜生没有解答娜拉走后的问题，胡适也仍未能拿出方案。于是，鲁迅提出经济权应成为斗争的中心。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妇女如何展开经济权的斗争？鲁迅式的解构形成一个无限指意链，最后只能为这个“自己不肯动弹的”中国感到绝望，却还期待着最终“鞭子打在背上”。不过，这鞭子“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可见，提出

一种替代性的理论，以至于以行动为导向的理论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所幸，我们已经走出了那个需要“鞭子打在背上”的理论建构背景。那么，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把“怎么办”作为理论构建的内容之一吗？

以学者“德性”重塑理论

福柯决然地指出，“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在于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知识分子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福柯批判与反抗的目标是以一名特殊专业的专业性去摧毁现实的自明性。评价一名理论家的贡献不在于他在理论被质疑之后做了什么，而归结为他止步于何处。否则，理论带来的只可能是新一轮的“治乱”循环。打破循环的关键在于树立一种新的理论态度，即以一种开放包容的社会学气质，去开启新的、多样化的可能。

因此，理论被质疑之后的“理论承诺”不再是谋求新的宏大理论或主义，而是化理论为学者的“德性”。着手于理论构建工作的学者应该首先重构自我的理论品质，以学术为业，从以立法者为企图的普遍学者转变为从事专门研究并提供新分析工具的特殊学者。思想最容易被殖民，却也最反叛、最可能实现相对独立。为后者计，思想可能需要与各种有霸权企图的“主义”“真诚地”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拉开一定距离，才能敏感地观察；若身处其中，可能需要在体制中反抗体制。如哈特、耐格里在筹划的“普遍游牧状态下的蛇形战术”时所主张的，后者可能是理论生活的常态。理论被质疑之后的“理论原则”是从理论解构的否定性中萃取比较方法与理论视角，把理论本身转换为追查理论所内含的形形色色危险的一种方法。哲学史家冯契先生所言向“智慧飞跃”，进而“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或许是开放包容的社会学人可以秉持的一种理论态度。